

把握世界主要矛盾，确立 正确的革命发展战略

——试论毛泽东判断国际形势的科学方法

张宏志

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把握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制订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必要客观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曾就此问题提出过重要的科学分析，对我们认清当今的国际形势，进一步坚定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毛泽东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正确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德、日、英、法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战败投降或者受到了严重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得到发展壮大，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蓬勃兴起，旧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世界力量对比正向着有利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方向发展。而美国则是唯一未在世界大战中遭受损失、反而大大增强了实力的帝国主义国家。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和抢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采取各种手段竭力谋取世界霸权。它封锁包围社会主义国家，干涉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多方图谋控制包括其盟友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成为全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利用当时手中掌握的核优势，以反苏、反共为旗帜，拼凑反动势力、到处抢占地盘，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一度使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反苏战争宣传甚嚣尘上。当时国际上的一些人恐美惧战、惶惶不安。

在这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时期，如何准确地判断形势，认清当时世界的现实主要矛盾和矛盾斗争焦点，并制订一条正确的方针路线，是全世界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传统观点，简单地从阶级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出发，孤立、片面地强调两种社会制度、两个阵营间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把苏、美之间的对抗，视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和焦点。因此，他们突出强调苏联在制止战争中的作用，要求世界革命运动服从苏联对美斗争的战略需要。毛泽东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洞察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对当时世界上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以及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四种基本矛盾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世界主要矛盾做出了精辟的论断，提出关于争夺“中间地带”斗争的独到见解。

毛泽东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人民强烈反对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社会主

义制度在战争中经受了考验，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美帝国主义一时也无法动员和集中力量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苏反共战争。因此，美国现在的主要目标是抢占美苏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遏制社会主义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并借机控制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他指出：在现阶段美国反苏、反共的战争喧嚣“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而实际上，“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中间地带”的包括“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因此，只有“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在“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①在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中，包含了他对当时世界局势的两个主要认识：其一，明确指出了在当时的国际斗争中，最尖锐、最激烈的冲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的直接对抗，而是美帝国主义与“中间地带”国家间侵略与反侵略、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新的世界大战不会很快爆发。其二，“中间地带”国家人民的反美、反帝斗争不但不会触发世界大战，相反却分散和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对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这两个重要认识所得出的结论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与全世界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世界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在“中间地带”国家的激烈争夺，是国际现实斗争的焦点；这一地区的人民革命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第一线主要力量。这个重要的结论，突破了苏共长期固守的教条主义框框，对国际斗争理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破除了对美国力量的迷信，敢于领导广大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最终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新中国。

五十年代后，毛泽东在“中间地带”论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国际斗争概括为几大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以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制约关系作为他分析世界形势、把握当前国际斗争焦点、判断世界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主要客观依据。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两派资本主义，一派是西方的，就是帝国主义；另一派是亚非的，这就是民族主义。……而我们是社会主义。”^②在这三者当中，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着尖锐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美帝国主义与处于“中间地带”的其它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控制反控制的矛盾和斗争。通过研究分析这三种力量、四个方面之间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做出了两个重要判断。第一个重要判断是，根据几大国际力量之间各种现实力量的对比，短时间内在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之间不会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紧迫危险，可能争取到一个相当长的和平时期。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力量正在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相对强大和巩固。在“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就会转而先“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由此看来，美帝国主义当前仍以“霸占中间地带为主”特别把它“现在的锋芒”，“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那些弱的进攻。”^③这就使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集中到亚、非、拉的民族主义国家。而在这些国家“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的统治占主要地位。”因而这里的“空气比较稀薄”、各种矛盾最为集中，“无产阶级有广大同盟军，……革命斗争特别旺盛。”^④美帝国主义向这一“空

气稀薄”的地区扩张，势必长期陷入多种复杂的矛盾斗争之中而难以脱身，从而分散、削弱了它的力量，加深了它内部的矛盾，束缚了它发动世界大战的能力。犹如“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自己的腿钉在桩子上。”因此毛泽东认为：“从各国人民人心背向、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亚非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况、以及我们自己的力量等方面来看”^⑤，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⑥。毛泽东指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当前面临的国际斗争形势特点，“也不是热战决裂打仗，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⑦在这种气氛下，“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⑧。我们不应被帝国主义的战争边缘政策所迷惑，而要实际分析一下我们应重视的真正危险和当前的主要任务。毛泽东认为，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把包围我们的那些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性质“完全估计为是侵略性的，只是当我们内部出了大问题，……那时它们会是侵略性的，只要我们内部巩固，它们就是防御性的，是堤坝性质”^⑨。是“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钙化组织”^⑩。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实际上指出，帝国主义对付我们的主要手段已经不是直接的武装进攻，而是在“冷战”压力下促使我们内部演变，或者是在我们内部发生动乱时，进行内外夹攻。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危存亡取决于我们国家内部的巩固。我们应据此制订相应的对策，把注意力放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方面。

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第二个重要判断是：可以利用几种主要国际力量之间的矛盾，建立起广泛的反帝、反美统一战线，制止或至少尽量推迟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争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间。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称霸全球的野心，使之与其他几种国际力量间的矛盾突出并激化起来，这就为我们建立反美统一战线创造了客观条件。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⑪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利用这一机会，“团结世界上各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派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⑫。依靠统一战线的联合力量来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应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以意识形态上的异同和是否靠拢社会主义阵营来进行取舍划分。毛泽东曾指出：“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就是一种独立自主。……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应“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⑬。至于“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⑭要善于运用“国际资本主义互相对立”这一“客观规律”，积极争取“间接同盟军”^⑮。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这一主要敌人。

毛泽东强调指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⑯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是维护和平的根本保证。他不赞成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苏联力量的作用，不赞成依赖核武器和大国间的外交活动。他曾经说：“当然，都有原子弹就可能取得和平，建立世界统一战线，也可能争取和平。”^⑰他认为，适当发展核武器和开展外交谈判，争取达成一定的妥协都是必要的，但“主要是依靠世界人民的斗争，建立世界统一战线。”^⑱从而坚决主张把维护世界和平的战略基点放在依靠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力量的基础上。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充分体现了他的辩证唯物观点，体现了他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他把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看做一个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具体考察各种矛盾的特殊运动规律，确定当时当地的主要矛盾，反对教条主义地把两种社会制度之间这样一个在长期历史发展阶段内始终存在的斗争看做是现实国际斗争中固定不变的主要矛盾。基于这一科学的思想方法，他正确判断了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斗争形势，提出了正确的革命发展战略。主张从现实的侵略反侵略斗争出发，团结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如果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能够普遍接受这个分析并实现这个战略思想，就有可能制订出一条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总路线和总战略，使社会主义事业得到更大的发展。世界局势的演变也很可能与今天有所不同。

二、历史曲折发展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教训

几十年来国际共运的曲折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并最终通过实践检验了毛泽东对世界矛盾的分析，证明了他对形势判断的正确。其中苏联解体这一事实，从反面提供了最有力的印证。由于在世界主要矛盾和斗争焦点上判断失误，苏共长期坚持把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看做世界一切问题的核心，把在两大阵营的武装对峙中触发世界核大战当做现实主要危险。因而强调“防止热核战争的斗争”是“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①9}；强调“苏联与全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力，首先是军力，是能制止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定性的因素。”^{②0}寄希望于依靠军事威力，特别是苏联的核威慑力量，通过在“武装力量方面一直保持对帝国主义者的优势”^{②1}，“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和平共处”^{②2}和“和平竞赛”，从而实现缓和和裁军，建立苏美妥协合作的世界体制。但实行这一战略的结果却南辕北辙，使苏联在帝国主义冷战战略的压力下亦步亦趋地走上了长期军备竞赛的道路而不能自拔。在这沉重的负担下，苏联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长期坚持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几度经济改革都因此中途夭折。结果造成军事工业畸形发展，民用产品长期短缺，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发展速度逐年下降。导致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稳固因而遭到动摇。这一战略选择上的失误，不能不说是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苏联借口社会主义阵营集体安全的需要，推行所谓“有限主权论”，以强权手段来保持阵营内部各国与苏联的高度一致。结果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间正常的平等关系，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人民中的信誉，对导致东欧发生巨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苏联共产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曾根据自己对国际形势的独立判断，于五十年代中期制订过正确的国际、国内战略。强调指出要利用和平的有利时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正式提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3}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提出调整经济、政治、国防、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我国在经济上重新确定了不同经济门类 and 地区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强调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政治上注意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党群关系；从而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与国内

政策相适应，我国在国际上积极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泛争取和团结亚、非、拉地区及西方国家中一切对我友好的国家和人民，对突破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起了重大作用。从今天来看，这一“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②4}，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十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后来对国内阶级斗争做了扩大化的估计，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和平演变的任务，仅仅理解为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政治思想斗争。结果从正确命题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从而使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耽误了近二十年的宝贵时间，错过了历史上的大好时机。特别是在中、苏两党论战升级并造成国家关系的严重恶化之后，我党随之做出了苏联内部已经变质的结论，把“反修防修”斗争当做当时最主要的任务。随后又在苏联侵捷事件的冲击下，把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认为美、苏两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必然会引起世界大战，而其中苏联作为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最富侵略性，也是对我国最大的威胁。从而根据这一判断改变了过去对战争危险的基本估计，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强调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在战备工作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把国际反霸斗争与国内“反修防修”错误地联系在一起，深挖国内的“修正主义”基础，造成巨大的政治、经济损失，留下了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但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苏联当时在对外关系中确实犯有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它同美国之间的斗争带有某种争夺世界霸权的色彩。我国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认定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判断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国主义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和由此而引发的世界战争的危险，进而断言世界前途“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判断的失误。造成这一失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毛泽东对国际问题的分析方法，而主要是由于他对当时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和判断脱离了客观实际。但在分析国际问题时，毛泽东则仍然坚持不单纯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来划分世界和确定世界的主要矛盾，因而，即使是在他发生失误期间，也仍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在他晚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中，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团结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反霸基础上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为后来创造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开辟了道路。从而大大改善了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三、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判断国际形势的科学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全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对世界矛盾的科学分析方法，对当今国际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对国际形势和战争危险的错误估计。当前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两个超级大国在长期冷战和对外扩张中遭到严重削弱；西欧、日本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增强；世界民族解放斗争转入了巩固国家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新阶段。邓小平同志纵观世界局势、把握时代主题，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当前的形势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②5}。作为南方贫困国家争取发展

的斗争，“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②6}。因此，当前世界上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不是战争或革命的问题，而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建立一个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这场多侧面的斗争中，经济领域中的斗争将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经济、技术实力，积极参加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才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只有“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真正“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②7}，取得反和平演变斗争的彻底胜利。因此，邓小平同志强调，“经济建设”“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②8}，我们必须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据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制订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抓紧有利时机，排除一切干扰，一心一意地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争取分三步走，到下个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在这一基本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采取了积极灵活的外交方针，既坚持反霸立场，又注意讲究策略，广交朋友，全面开放，使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进入建国以来的最好时期，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两极体制解体后的今天，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历史又一次进入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如何正确判断国际形势的问题也再次提到我们面前。此时重新回顾毛泽东对世界矛盾的科学分析，避免重走他后期在某些内外因素干扰下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对于我们认清当前形势的特点，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仍有着重大意义。当苏联、东欧巨变之后，国际反共势力气焰十分嚣张，妄图以压促变、一举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时间，反华宣传陡然升级、经济制裁接踵而至，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骤然变得严峻起来。此时此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否已成为世界主要矛盾？和平演变与反演变的斗争是否是现在国际国内斗争的焦点？这都是我们必须慎重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邓小平同志正是在全面分析世界矛盾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和对策，使我们的党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保持了头脑的清醒。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国际形势还在不断地演变，我们应继续观察它的发展趋势，不因暂时的现象而受到干扰。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外部压力一时间的增强，并不能改变我们当前的工作重点。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党没有再次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避免了重蹈历史的覆辙。

几年来的国际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决策的正确性。苏联解体的结果，并没有出现美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反而使过去被掩盖或压抑着的许多矛盾暴露和突出出来。各种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冲突此起彼伏，形成了许多新的世界热点，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特别是西方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美国不可能把所有西方联合起来全力对付我们。尤其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今天，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对外交流的日益广泛，美国更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孤立起来。因此，虽然说在世界形势仍在不断演变的今天，尚不能对今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下最后的结论。但事实已经证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没有成为这个世界上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我国在国际斗争中仍有着广大的回旋余地。目前，国际形势正向好的方向发展，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必将对整个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影响。毛泽东多年前曾预言并寄予希望的那种西方破裂、亚非崛起的世界新局面已经初露端倪，世界多极化的前景已经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运用在多年改革开放中所

创造的国内外有利条件，学习毛泽东的国际斗争策略和艺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把握时机、趋利避害，就一定能够而且事实上已经做到打破国际反动势力的制裁，顶住一切外来压力，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进行下去。未来世界对我们充满了挑战和机遇，让我们紧紧抓住历史再次给予我们的这一难得时机，迅速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最后，让我们借用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形势时用过的话：“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⑳

注 释：

- ①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 ②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以基伏·斯托伊卡为首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5日，（见室存档案）。
- ③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8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
- ④⑧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十五国兄弟党领导同志谈话记录，1959年3月12日，（见室存档案）。
- ⑤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2月28日，（见室存档案）。
- ⑥⑭⑳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 ⑦毛泽东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7日（见室存档案）。
- ⑨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4日，（见室存档案）。
- ⑩毛泽东1958年与赫鲁晓夫第三次会谈时的记录，1958年8月2日，（见室存档案）。
- ⑪毛泽东审阅过的《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稿》1958年9月8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
- ⑫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来信的复信》的修改部分，1964年2月。
- ⑬毛泽东《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1958年9月2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
- ⑮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21日。
- ⑯毛泽东接见正在中国访问的几个日本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1960年1月21日。
- ⑰毛泽东同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
- 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1963年7月14日，（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 ⑳《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通知书》1960年6月21日。
- ㉑《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1963年3月20日，（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 ㉒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1964年2月（见1964年4月27日的《人民日报》）。
- ㉓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56年9月15日，（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 ㉔邓小平《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1985年6月4日，（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㉕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㉖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4月22日，（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 ㉗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㉘毛泽东《对〈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的批语》1958年11月25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